本版编辑：龚 克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124

正定实践的思想意蕴

——读《知之深 爱之切》

□ 朱永刚

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必须认识治国理政新实践；观治国理政之胜状，览发展实践之大观，不忘回溯其泉源，方能领会其根本。习近平的《知之深 爱之切》书写正定实践，展现胆识气魄，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思想源泉。

系统思维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习近平总是善于从全局角度、以系统思维看待问题，从整体上思考谋划开展实践。真理的长河流淌的是实践的汗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习近平在河北正定任县委书记时，这种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在其工作实践中就得以切实体现和鲜活运用。在《知之深 爱之切》37篇文稿中，习近平对做好思想教育、文化、人才、妇女儿童、老干部、基层团组织、领导班子、改革、农业、经济、党风等各方面工作分别做出部署和要求。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注重各领域关联性和各项举措耦合性，使各项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正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改革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交融。

正如在附录中蒋丰采写的通讯《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所记载的那样：“在这改革之风劲吹的岁月里，严冬的寒气已凝固不住播种者滚烫的情怀。”在那百废待兴，山河重整的岁月里，改革者以剑拔弩张的气魄、大刀阔斧的胆识、笃定执着的信仰，竭力去换取祖国和人民的富饶与荣光。然而，面对积重难返的矛盾和问题，仅仅凭借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整顿难以奏效。整体谋划、全局考量、系统推进，不仅考验着改革者的实践决心，而且检视改革者的实践智慧。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种系统思维，“一盘棋”思想，正是习近平等正定县委一班人带领正定走出死胡同，打赢翻身仗的重要因素。

战略视野

何谓战略视野？习近平在书中《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一文中指出：“搞经济，搞大农业，都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从时间上看得远一些，从空间上看得宽一些。在宏观战略指导下研究自己的微观战略，在全局发展战略基础上研究局部的发展战略。在国外，战略研究很时兴。在国内，发展战略研究也引起重视，各省都在研究战略问题。”所谓战略视野，一是要以长远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体现恢宏的战略思维。善于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二是要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观察和处理问题，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做到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熟悉国情又把握世情。

战略视野决定战略高度与战略目标。蒋丰在《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写道：“走访正定城乡，我却听到上上下下都在谈正定的战略目标、正定的战略措施。当人们看到我惊奇的目光时，又神秘地一笑，悄悄地告诉我：‘这是习近平同志传染给我们的。’习近平主张80年代的‘七品芝麻官’，要讲战略，要有气魄！”非凡的战略视野，使得年轻的县委书记心中蕴蓄着宏大的战略目标。有了战略目标，就得有战略行动。习近平的战略视野和胸怀在正定原野中蕴蓄，进而又在正定实践中发轫生根。

改革智慧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跃。然而，获得改革认识，凝聚改革共识却并非易事，而躬亲实践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做改革实干家更是蜀道之难。在该书《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一文中，习近平从思想、工作、方法三个方面指出改革面临的问题。比如，从思想上讲，“有的同志对改革工作不主动、不敏感，缺乏改革责任感，等靠思想很突出，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有的同志说‘宁肯不改革也不能犯错误’，似乎搞改革就要犯错误，不改革就能平安无事。”从工作上讲，“改革存在着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各部门之间动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比如简政放权，少数中间部门仍然揽着不放，‘大婆婆’开明了，‘二婆婆’又管紧了。当然，也有企业当惯了‘小媳妇’，乍一放开手脚感到不适应，给了权不敢用、不会用的。”从方法上讲，有的事急于求成，搞一刀切。有的事自上而下搞，群众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基础，产生了不应有的阻力。正是对这些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和正定人民进行的改革实践才有了智慧源泉和方向所在。

诚如蒋丰在通讯中记载：“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至于如何改革，习近平说：“我从不言必称改革，只是想扎扎实实做几件于国有益、于民有利的事情。改革是中华民族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大趋势’，个人不必故作惊人之举。我理解，改革不仅仅是改变。解放社会生产力，解除旧有观念对人的桎梏，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在改革进程中，要研究国情，要把握群众心理，要避免破坏性震动，否则，盲目改革只会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弄不好，还会给事业带来损失。”事实证明，习近平的改革思维，不仅在正定实践中扎下了深根，而且在后来的闽东实践、浙江主政、大国治理中逐步形成发展成熟，越来越放射出真理的光辉。

家国情怀

通观《知之深 爱之切》，细细品味可以发现，浓浓的家国情怀是统领其全部内容的活的灵魂，渗透于文字背后的浩瀚的思想海洋之中。事实上，习近平的家国情怀不仅源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读书治学的最高追求，更得于他与正定人民和正定大地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和火热实践。在该书序言中习近平坦言：“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正定人有这样的家乡是值得自豪的，我和许多外地来到这里的人把正定引以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也由衷地产生了这种自豪感。”在附录《我爱自己的第二故乡》中，习近平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勤劳的人民。我爱自己的故乡。”对正定的情怀，对人民的感情，溢于言表，流淌在字里行间。

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她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爱正定，不是一句口号。从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到共同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从到基层寻求“源头活水”到刹住新的不正之风，没有气势不行、没有方法不行。在正定的习近平对农村开始了理性的思索，他跑遍了全县25个乡镇，走访了县直大多数机关，他再也离不开人民了。他说：“我要为人民做事情，要同人民唱一曲悠扬的‘农家乐’。”爱正定，是具体的实在的。他在正定县城大街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与正定县干部群众一起祭扫郝清玉烈士陵墓，对烈士家属表示亲切慰问；还在县城街头发放《民意调查表》。在《忆大山》中，他深情写道：“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他以从未有过的主人翁责任感深情地爱着正定和那里的人民，这种滚烫的家国情怀，从未间断，与日俱增，深深植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实践沃土，不断生长出治国理政思想的美丽花朵。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博士）

学员作品

古风·兰考行

□ 郭鲁江

屹屹焦桐下，息息旧时情。
飞沙连朔漠，风吹了无明。
春种万颗粟，秋收一瓢羹。
百户炊烟断，对面唤无应。
闻此皆蹙眉，捶胸泣不成。
临危欣受命，誓将大难平。
寒暑不惜身，筹谋到天明。
疏水究源流，封沙学妙经。
大雪立柴门，千里留懿行。
痛病全不顾，黄河感而鸣。
民如泰山重，己若鸿毛轻。
除害有真识，齐家励后生。
孜孜求大治，不惭世上英。
山河重安排，阴阳隔流星。
举目仰焦桐，荫荫翼苍精。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办公厅）

校园春天

□ 刘英杰

仿佛一夜之间，
花红柳长。
校园的春天，
布谷声声浸染着长长书卷，
唤醒了沉睡的人、混沌的地。

听得见，
种子在滋滋发芽，
嗅得出书香墨韵。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笑容，
莫名的活力在心房流淌。

（作者系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2班学员、农业部人事劳动司副司长）

诗 歌

文化观察

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失去了群星——

《泰戈尔作品全集》在京首发

□ 木 言

中央党校文史部原副主任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全集》，于泰戈尔诞辰155周年之际完稿出版。5月5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出版社在京联合举办了《泰戈尔作品全集》首发式。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得诺奖的第一个亚洲人。他热爱中国文化，在印度国际大学创建了中国学院，并使之成为印度第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中心。他对文明和文明互动的论述，成为促进中印关系升华的主要理论基础。

泰戈尔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66部诗集、96篇短篇小说、15部中长篇小说、80多个剧本、大量的散文。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立项，将《泰戈尔作品全集》纳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全集共18卷33册，每册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部分，约1600多万字，历时七年，是国内首次完整收录泰戈尔的全部孟加拉语作品以及作者亲自翻译的八部英文诗集和在国外发表的演讲汇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

除却泰戈尔亲自改写的八部英文诗集，本书的译文全部从孟加拉原文直译，由国内15名一流孟加拉语专家翻译，不收录转译自印地语、英语的译文，并且选用的是公认的权威版本——泰戈尔国际大学编辑的《泰戈尔作品集》普及版本进行翻译。令人感动的是，年届8旬的中央党校泰戈尔专家、资深翻译家董友忱亲自挂帅领衔，历时7个春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鼎力相助，承担了全集诗歌、散文、戏剧部分的翻译审校工作，纠正了许多以往译者对泰戈尔作品的误译。

印度前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欣闻中国将出版《泰戈尔作品全集》，特为本书的出版题写了贺词。在贺词中，她表示，“我确信，即将出版的这部文集，会让中国人民更好地欣赏他的作品，并由此来了解他的国家和民族。”孟加拉国驻华公使、印度驻华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了会议。

吴玉章的革命风范

□ 康井泉

最近，拜读了《吴玉章回忆录》《历史文集》《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等著作。阅读这几部著作，是享受，是陶冶，也是一种深刻的教育体验。一气呵成的阅读之中，深深地被吴老的传奇的革命经历所吸引，被吴老的执着精神所感动，被吴老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名永珊，字树人，号玉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五老”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今年是吴老逝世50周年。1960年，82岁的吴玉章写下的这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既是他毕生追求真理的生动写照，也是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教育思想，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1983年为吴玉章塑像题词称其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心神俊逸绝飞尘，百炼成钢是此身”

这是谢觉哉老人在吴玉章七十大寿时写的一首贺诗中的精彩一句，充分表达了谢老对吴老坚强革命意志、坚定追求真理、坚持信念忠贞等精神的由衷敬佩与赞美之情。确实，吴老88岁逝世，历经百年历史，参加了近一个世纪的每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活动，始终站在革命运动的最前列奋斗，思想先进，品格高尚，奋斗终生，坚忍不拔，信仰、道德、文章、业绩令人敬仰，理想信念、立身处世、人品作风，垂范后人，是非凡卓越、超群流芳的人物。《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记录了他一生中思想经历两次大的“决裂”：一次是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在孙中山革命派的思想影响下，与改良主义决裂走上激进民主主义的道路；一次是20年后，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决裂，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参加共产党。他始终处于中国革命的前沿，从不谋私利，不重权位，光明磊落，对祖国、对人民是非分明、大节凛然，备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干革命究竟为什么？吴老给出了很好的回答。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吴玉章作为四川代表到南京，当时有些投机革命的人对他讲，你来晚了，官都分完了，他听后十分鄙视。他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推翻清朝统治，使国家富强起来。还有，《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记载，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老立场鲜明：“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吴老真正是品格高尚、风范景崇、光彩照人的人物。

“仗剑纵横催虐骑，不教荆棘没铜驼”

这是吴老1904年在自己照片上题写表达自己抱负的诗句，表达他献身祖国的抱负和激情。《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记录，吴老在参与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之后，又于1917年重建了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在当年5月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所作讲演中，就强调青年们到法国去要探求革命思想。五四运动以后吴玉章同志主持成都高师时，以当时四川最高学府的校长身份，保护全省学生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使这所学府成了当时成都进步势力的大本营。当时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被反动当局逮捕，吴玉章同志立即去电保释，并聘请恽代英同志到校任教。由此可以看到吴老的革命意志、精神追求和秉持大义的高尚形象。

在吴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漫长岁月中，为革命战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培养了好几代干部。他的教育活动，时间长，方面广，经验多，成就大，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他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教育家，而他之所以成为卓越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正因为他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奔走革命，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兴办教育的。他与同时代许多进步的教育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把教育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坚定明确地为革命的需要培养人才。毛泽东同志对吴老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很高评价。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庆祝吴玉章六十寿辰，毛泽东亲临致祝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

“马列为师范，门徒改学风”

这是董必武老人在吴玉章七十大寿时写的一首贺诗中的诗句，是董老对吴老身上所闪烁的责任使命精神的赞美与颂扬。吴老留给青年的“好范畴”很多，他积累的学习方法，就是留给青年和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吴玉章明确指出：“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目标既定，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都不灰心丧气，不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目标”。他强调说：“学习能不能有成就，首先决定于他的学习目的是否正确。”什么样的学习目的才是正确的呢？首先，“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次，“学习业务”，“应该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些看似很宏大的目标，在吴玉章看来并非空洞的、遥不可及的。

在接受马列主义以后，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吴老就主张学习要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1949年2月，他在华北大学学生毕业典礼上指出：“工作也是学习，随时都可以学习。在生活中学习，不一定死啃书本。学习是自觉主动的，如果不自觉便什么也学不到，自觉地学习，到什么地方也可以学习。”他以自己为例指出：“最重要的在实践……大革命失败后，我到苏联去，看了许多宝贵的书，并到劳动大学学习。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实在不够，同时明白了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吴玉章提倡教学要结合实际，认为“学生一经毕业，即服务社会，故在修学期中，宜多予各生以研究之机会”。为此，学校建立了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学生进行生产实习的制度，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广泛好评。吴老追求真理、勇于实践、无私奉献、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的学风；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悉心指导、诲人不倦，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爱戴。

“亮节英姿书百代，一生豪杰万人师”

这是谢韬同志在吴老诞辰115周年写的七言诗中的一句，很能表达吴老一生的人格修养和风采魅力。吴老经常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坚持自我批评好比洗脸、扫地，丢掉的只是污垢、灰尘。坚持自我批评只能有益于革命，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运用这个武器。吴老言而必行，古稀之年还时常登上讲台给自己亲手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师生讲党史。

吴老还自觉开展自我批评。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时，远东出版局曾约他编写一本中文教科书。当时，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很激烈，书一出版，托派就从书中抓了一些“辫子”，攻击他犯了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吴老知道这是托派有意挑衅，但为了更有利于与托派斗争，他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加紧研究马、恩、列、斯的有关理论，并检查了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在检查中，果然发现自己的文章中只是简单地提苏联消灭了富农，没有说明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同时发现别的文章中也有错处。他便给党组织写了一篇声明书，自觉地承担起全部责任，同时对错误的来源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表示誓与错误观点作斗争。林伯渠“嘉许他认识错误并愿意和错误作斗争，这是党员应有的态度。”

吴老说：“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时机，奋勇前进。”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文史天地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